

# 論毛匪澤東對軍隊領導的成敗問題

簡鐵

## 一 前言

從一九五四年起，由於韓戰對匪軍的教訓，促使軍隊進入正規化。從此以後，匪軍最高領導人（匪黨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便連續遭到各高級將領如彭德懷、黃克誠、譚政、洪學智、賀龍、羅瑞卿、蕭華、蘇振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林彪、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集團反叛。這些事件，毛澤東不論將其提高到黨的問題或建軍問題上，通常稱之為「兩條路線的鬥爭」。

關於「在建軍路線上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非自匪軍進入正規化開始，而是從匪軍建立以來就開始的。如一九二九年「古田會議」，「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的決議，其中指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決不是單純的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羣衆、組織羣衆、武裝羣衆、幫助羣衆建立革命政權以至於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這是毛澤東規定軍隊的任務，也是他一再強調的「無產階級建軍路線」。又指出：「紅軍的共產黨內存在着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份，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份所構成的……」。這些非無產階級思想：包括「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氓思想」、「盲動主義殘餘」等等。這是當時紅軍第四軍的現象，也是毛澤東迄今指斥的「資產階級建軍路線」①。

從這次會議之後，毛澤東在軍隊領導上，建立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傳統觀念，而共匪迄今，仍稱毛澤東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按：此決

議係根據當時駐上海匪黨中央九月指示，由前軍委員集體起草的），以及一九六〇軍委擴大會議決議②，稱其為「建軍綱領」。「使紅軍完全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③。現在，就從這個綱領，來看毛澤東幾十年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所發生的問題。

## 二 政委對軍隊的控制

匪軍領導的體制，乃是照搬蘇俄布爾什維克黨對工人自衛隊領導的體制，即實行政治委員（簡稱政委）和軍事指揮員二元領導制。共匪一九三二年訂頒的「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暫行條例」，載明「政治委員不僅是蘇維埃政權在紅軍中的代表，而同時是中國共產黨在紅軍中的全權代表……執行黨在紅軍中政治路線及紀律的完全負責者」。這個條例雖然歷經修訂，但政委的權力仍然不變，他「有監督一切軍事行動和軍事行政之權」、「有停止軍事指揮員命令之權」、「有對軍事指揮員執行革命法律之權」④。由於政委的權力是如此之大，因而使軍事指揮員用以指揮軍隊作戰的幕僚機關，如司令部、後勤部，都受政委直接領導的政治部監視，形成制衡的現象。舉例言之，軍事指揮員命令司令部起草一項作戰計畫或作戰命令，未經政委簽字不能調動軍隊，而後勤部也不發給作戰補給。這是匪軍內部的實際情況，如果缺乏瞭解，便容易誤認毛澤東對軍隊的領導，永遠受到熱忱的擁戴，所以在歷次反叛事件中，沒有一個師級部隊起來反毛。其實，毛澤東對軍隊的領導，不是建立在擁戴的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各級政委的嚴格控制。關於這一點，毛澤東在林彪事件中，也曾透露，他說：「我不相信你黃永勝能够指揮人民解放軍造反，軍師團還有司政後，你調動軍隊搞壞事，聽你的？」⑤

關於蘇俄軍隊的二元領導制，是列寧當時為鎮壓工人自衛隊中的俄帝

舊軍官所設，列寧死後，這個制度繼續延用。到一九三九年蘇芬戰爭發生，便出現了一種現象，即軍事指揮員在政委長期控制之下，喪失了指揮上的主動性，所以蘇軍在蘇芬戰爭中師老無功。一九四〇年，史達林嘗試廢棄政委制度，但他失敗了，蘇軍在蘇德戰爭中竟發生軍事指揮員率部投敵。一九四一年，史達林又恢復政委制，以穩定軍隊。到一九四二年，蘇軍在蘇德戰爭中傷亡過大，尤其軍事指揮員的傷亡較政委更大，於是史達林乃以政委調任軍事指揮，鍛鍊他們指揮作戰的經驗，同時并增強軍隊的黨性，從此蘇俄軍隊中，再不復有二元領導制出現。

毛澤東對於史達林的經驗，當時也有部份接受。如一九四五年，他實行軍隊黨委會（由正副政委、正副指揮員、政治及軍事幕僚長，下設資深黨員組成）集體領導制。其後，在全面叛亂作戰中，更積極提高軍事指揮員的權力，政委作為軍事指揮員的副手。如毛澤東起草的「關於遼瀋戰役的戰略方針」⑥、「關於平津戰役的戰略方針」⑦，所署受領人是林彪（軍事指揮員）在前，羅榮桓（政委）在後。惟至一九四九年三月，「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結束，毛澤東又重新調整領導體制，提出「黨委會的工作方法」，要求各級政委要當好黨委會的「班長」⑧。於是軍事指揮員的權力下降，變成了這個班的小兵。尤其在韓戰中，一個砲兵連選擇揮地，據說未經指導員（按：匪軍團以上稱政委，營稱教導員，連稱指導員）同意，不能作算，而這些指導員，又都不是砲兵專家，他們在軍事上常常發生錯誤⑨。所以後來彭德懷對於此類事件，要求軍隊領導人「既要紅，又要專」，并指責政治人員的若干跋扈行為，是「紅的騎在專的頭上」。

如果從全般檢討，蘇軍早期和匪軍迄今堅持的政委制度，有其優點，也有其劣點。在優點方面，不論蘇俄革命或共匪叛亂，其軍隊的組成，都是非常複雜的，尤其軍事指揮員的成份更不一致，如果不是憑藉政委制度的嚴格控制，軍隊的問題更多，故從這方面看，政委制度是有其一定作用的。在劣點方面，不論蘇俄革命或共匪叛亂，既然完成了一定任務，其軍事指揮員已經過戰爭的淘煉，其軍隊已進入正規化，如果繼續堅持政委制度，對軍事指揮員的控制有增無減，那就自然的發生以下兩種現象：一種是蘇聯的現象，即軍事指揮員喪失指揮上的主動性，這雖然發生在戰時，但它是屬於消極性的。另一種則是共匪的現象，即高級將領集團反叛，這雖然發生在平時，

但它是屬於積極性的。以上這兩種現象，為何蘇俄在戰時發生的是消極性的，而共匪在平時發生的則是積極性的？這應該歸咎蘇俄和共匪對軍隊教育的不同：單就毛澤東言，他不是強調「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就是強調「造反有理」，他這樣的教育軍隊，軍事將領焉能不叛。

### 三 特務對軍政將領的摧殘

毛澤東對軍隊堅持黨的絕對領導，堅持政委制度，但是，黨在軍隊的全權代表——政委，并不一定完全忠於黨和忠於毛澤東的。就歷次反叛事件而言，有黨的副主席（林彪），有黨的軍委副主席（彭德懷、賀龍、林彪），有總政治部主任（譚政、蕭華），有海空軍政委（蘇振華、余立金、李作鵬等）。因此，匪軍的政委制度，只能算是控制軍隊的手段之一，而共匪控制軍隊（包括對政委控制在內）的另一種手段，則是特務組織。共匪的特務組織，其建立時間，也是從建軍以來就開始的。如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動，設有政治保衛處（李立三任處長）。其後於一九三二年，又設偽國家政治保衛局。目前共匪的特務組織，是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之下，分為黨政軍三個系統，其黨中央的負責人，是現任匪黨副主席的康生，其隸屬於黨的特務部隊，是汪東興統率的中央警衛團。隸屬於軍的特務部隊，是各級軍事機關的警衛部隊，以及由軍隊政工系統直接佈置的祕密細胞，如團級以上幹部的警衛員、汽車司機、家庭嫖娼、營級以下幹部的通信員等。隸屬於政的特務部隊，是公安部分駐各地的公安部隊。這些不同系統的特務部隊，其數量非常之大，他們在黨的統一領導之下，對於保衛任務是負有整體責任的。根據共匪一九三二年訂頒的「國家保衛局組織綱要」，軍隊的保衛組織，規定屬於偽國家保衛組織的一部份⑩。目前在組織形態上雖然歷有改變，但任務則是不變的。共匪所謂「保衛」，如果用中國文字的傳統解釋，只能說明一半。這和各國共黨一樣，他們所用的術語，都不宜用各國文字的傳統解釋來加以說明。關於這一點，張聞天曾經有所解釋，他說：「保衛局是同反革命做鬥爭的最高權力機關，他可以逮捕、拘留、審訊以至於處決反革命份子」⑪。根據這樣的解釋，可以瞭解保衛人員（包括保衛細胞）的任務：一是保衛被保衛者的安全，一是奉到密令後就地處決被保衛者。因此，匪軍團級以上幹部的

警衛員、汽車司機、家庭保姆，營級以下幹部的通信員，他們朝夕隨伴各級幹部，除了保衛各級幹部安全之外，他們還負有秘密處決各級幹部的任務，如在江西蘇區時期，紅軍第七軍軍長李明瑞，因被毛澤東的肅反所逼，在粵部率領一個衛隊連，準備向國軍投誠，才一起步，便被他的警衛人員從背後一槍，把李明瑞槍殺了<sup>12</sup>。又如林彪之死，據傳是在北戴河寓所，被其警衛員槍殺，這并非絕無可能。

毛澤東對於黨軍人員秘密處決，在他的歷史中，有兩次驚人的大血案，即一九三〇年「富田事件」，一次逮捕和處決了四千四百餘人<sup>13</sup>。另一次在延安槍殺了二萬共軍幹部（毛澤東向已死的印尼共黨頭子艾狄所說的）<sup>14</sup>。最近十餘年來，毛澤東對反叛將領，是否也有秘密處決，雖無統計資料，但也不斷的加以處決。單就林彪事件而言，除林彪已死之外，其餘如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還有林彪之妻葉羣，子林立果的失踪，頗值懷疑。如果說，他們都是墜機蒙古溫都爾汗，那麼他們的「叛國」罪證確實，毛澤東應該立即公佈，使全軍瞭解，在這種情況之下，毛澤東整肅軍中親林反叛份子，不僅不至引起軍隊的反毛憤怒，而且可能獲得軍隊的支持。但是，毛澤東沒有這樣做，直到九月三十日（一九七一年），距離林彪死亡已經十八天，蒙古透露了墜機事件，這時共匪才以側面的方式，傳說林彪「粉身碎骨」。然而，墜機的罹難者是否就是林彪等人，共匪迄今提不出真憑實據，即就一九七二年元月，匪黨中央傳達的內部文件<sup>15</sup>，也只是將李偉信的口供拼湊而成，而這個拼湊的文件，指定由各級黨委會學習之後，先在幹部中傳達，再發動批判，這些都是頗有疑問的。

至於毛澤東在歷次反判事件中，究竟整肅了多少高級軍政將領（包括次級的和副職的），就現有資料可資查明者，約為八十七人，其中除林彪已死，其被監管或處決的尚有五十人，被解放的只有三十六人。這些人員是：

一九五九年彭德懷事件，被整肅的高級軍政將領，計有偽國防部長彭德懷、總參謀長黃克誠、總政治部主任譚政、總後勤部長洪學智、瀋陽軍區司令員鄧華等四人，這些人員迄今都未被解放。

一九六六年賀龍、羅瑞卿事件，被整肅的高級軍政將領，計有匪黨軍委副主席賀龍、總參謀長羅瑞卿、總政治部主任蕭華、總後勤部政委李聚奎、海軍第一政委蘇振華、空軍副司令員劉震、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成都軍區

司令員黃新廷、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新疆軍區司令員王恩茂等十人。這些人員，已被解放者，計有蘇振華（現任海軍第一政委）、劉震（現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楊勇（現任新疆軍區司令員）、黃新廷（現任裝甲兵司令員）、秦基偉（現任成都軍區司令員）等五人。

一九六八年楊成武事件，被整肅的高級軍政將領，計有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空軍政委余立金、北京衛戍司令員傅崇碧等三人。這些人員，現都被解放，楊成武（現任副總參謀長）、余立金（現任民航局政委）、傅崇碧（現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

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被整肅的高級軍政將領，計有偽國防部長林彪、總參謀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海軍第一政委李作鵬、總後勤部長邱會作、北京衛戍司令員溫玉成、副總參謀長閻仲川、陳繼德、總政治部副主任黃志勇、總後勤部副部長韓振紀、張明志、嚴俊、王希克、陳龐、周玉成、海軍副司令員張敬一、空軍副司令員曾國華、王秉璋、譚家述、何振亞、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新疆軍區司令員龍書金、福州軍區第一政委周赤萍、武漢軍區政委劉豐、濟南軍區政委袁昇平、福州軍區副司令員吳保山、成都軍區副司令員王東保、瀋陽軍區副司令員吳習智、貴州省軍區第一政委藍亦農、江西省軍區第一政委程世清、浙江省軍區第一政委南萍、江西省軍區司令員楊棟棟、浙江省軍區司令員熊應堂、廣西省軍區政委章祖珍、河南省軍區政委路揚、陝西省軍區政委谷鳳鳴、空軍第四軍政委王維國、空軍第五軍政委陳勵耘等三十九人，這些人員，除林彪已死及部份失蹤之外，其餘都未被解放。

此外，在歷次各個事件中被整肅且已被解放的高級軍政將領，計有鄧小平（原任匪黨中央總書記兼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現任匪黨副主席兼國務院副總理）、向仲華（原任裝甲兵政委，現任副總參謀長）、李達（原任國防部副部長，現任副總參謀長）、王尙榮（原任總參謀部作戰部長，現任副總參謀長）、何正文（原任成都軍區副司令員，現任副總參謀長）、伍修權（原任匪黨中央國際連絡部長，現任副總參謀長）、梁必業（原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現任如前職）、田維新（原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現任如前職）、張宗遜（原任副總參謀長，現任總後勤部長）、劉道生（原任海軍副司令員，現任如前職）、王輝球（原任空軍政委，現任如前職）、成鈞（原任空軍副司令

員，現任如前職）、張廷發（原任空軍副司令員，現任如前職）、蕭克（原任國防部副部長，現任軍政大學校長）、宋時輪（原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現任軍事科學院院長）、廖漢生（原任國防部副部長，現任南京軍區政委）、徐志清（原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現任濟南軍區政委）、鍾漢華（原任武漢軍區政委，現任廣州軍區政委）、徐深吉（原任空軍副司令員，現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陳宏（原任裝甲兵司令員，現任成都軍區副司令員）、張愛萍（原任副總參謀長，現任國防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劉志堅（原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現任軍事科學院政委）、王平（原任軍事科學院政委，現任砲兵政委）、向守志（原任砲兵副司令員，現任第二砲兵副司令員）、吳克華（原任砲兵司令員，現任鐵道兵司令員）、崔田民（原任鐵道兵政委，現任如前職）等二十八人。

#### 四 毛澤東的後事安排

毛澤東近十餘年來，對反叛將領的處置，不像江西和延安時期的亂捉亂殺，這不是毛澤東變得仁慈，而是有其原因的。這些原因，可歸納為以下三項：一、時期不同；毛澤東在江西時期製造「富田事件」，在延安時期進行坦白肅反，大量處決幹部，不易為外界所知曉，在當前如果再製造類似富田或延安事件，將震驚世界，同時也將激發現職將領的全面反叛。二、處境不同：當前毛澤東內有全軍不穩，外有國軍存在，如果再製造類似富田或延安事件，將是匪軍反毛、國軍反攻，裏應外合，裏外夾擊的良好契機。三、年事不同：毛澤東已經八十一歲，接班人培植尚無結果，在其垂死之年，尚處於內外鬥爭交困之境，如果再製造類似富田或延安事件，將加速其政權的動搖甚或崩潰。以上這三項，其一、二兩項暫不置論，單就第三項分析如下：

從林彪事件，特別是從一九七三年八月，匪黨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始，毛澤東對接班人的培植，大有萬事莫急於此者。從種種表現來看，毛澤東當前的作法，是指導新的一派，即江青領導的，從文化大革命鬥爭中逐漸得勢的一派，先爭奪黨權，爾後再奪取軍權，以謀求他權力轉移的安全。就毛澤東領軍奪黨的歷史而言，這是反其道而行的。因為毛澤東的一生，都是先奪軍權，而後才鞏固黨權，如一九二九年「古田會議」的鬥爭，是爭奪朱德的軍

權<sup>①</sup>。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的鬥爭，是爭奪周恩來的軍權<sup>②</sup>，同年「巴西會議」之後<sup>③</sup>，到一九三七年鬥爭張國燾的「延安會議」，則是解決和吞併張國燾的軍權<sup>④</sup>。至於毛澤東的黨權，在一九四五年匪黨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前，實際早經取得，「七大」會議，不過是毛澤東取得黨的全權後，完成合法手續而已。當前毛澤東為培植江青一派，不惜走相反的道路，這是因為江青一派缺乏領導軍隊的人選，而且江青一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再衝擊軍隊，在匪軍中刻下了惡劣印象，迄今仍無法取得軍隊的諒解。所以目前毛澤東的安排，不論從中央到地方，從國防部到軍區，甚至從解放幹部到擢拔幹部的各種措施，都在貫徹黨對槍的指揮。這些措施和步驟，可歸納為以下四方面：

(一) 控制黨中央權力機關：匪黨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其所以要在秘密中召開，而且正式會議完全是一個形式，主在使江青一派，藉毛澤東的權力安排，取得黨中央權力機關的重要席位。例如五個副主席，江青一派佔有三個，即王洪文、康生、李德生。政治局九個常委，除毛澤東外，江青一派佔有四個，即王洪文、康生、李德生、張春橋。政治局二十一個委員，除毛澤東外，江青一派佔有十一個，即王洪文、康生、李德生、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紀登奎、吳德、華國鋒、陳永貴、汪東興。政治局四個候補委員，江青一派佔有兩個，即吳桂賢、倪志福。至於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共三百一十九個，江青一派佔有一百二十個。此外，毛澤東還下達手令（至十屆二中全會始予追認），令鄧小平進入中央政治局，并且遞補李德生副主席缺額。

(二) 調整地方權力結構：共匪地方權力，向以軍事司令員為核心，他們有其嫡系部隊和勢力地區，更兼地方黨委第一書記，形成黨槍權力合一。一九七四年元旦，毛澤東利用春節集會，一次調動八個軍區司令員，連同原已調動的三個，則十一個軍區司令員全部調動，使他們和嫡系部隊、勢力地區、以及地方黨委會（還包括革委會）的關係完全脫離，而地方權力，則完全落入軍區政委之手。如：

軍區司令員調動部份：計有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調瀋陽軍區，瀋陽軍區陳錫聯調北京軍區。以及南京軍區許世友與廣州軍區丁盛、濟南軍區楊得志與武漢軍區曾思玉、蘭州軍區皮定鈞與福州軍區韓先楚，都對調職務。至於原來調動的三個軍區，則是昆明軍區王必成、成都軍區秦基偉、新疆軍區楊勇。

政委兼掌地方權力部份：計有北京軍區第二政委吳德兼匪黨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政委鄧子厚兼匪黨河北省委第一書記。濟南軍區政委白如冰兼匪黨山東省委第一書記，第二政委彭冲兼匪黨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福州軍區政委廖志高兼匪黨福建省委第一書記。武漢軍區政委劉建勛兼匪黨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廣州軍區第一政委韋國清兼匪黨廣西省委第一書記，政委趙紫陽兼匪黨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政委華國鋒兼匪黨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第一政委周興兼匪黨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成都軍區第二政委李文章兼匪黨四川省委第二書記。蘭州軍區政委李瑞山兼匪黨陝西省委第一書記。新疆軍區第一政委賽福鼎兼匪黨新疆省委第一書記。瀋陽軍區第一政委曾紹山兼匪黨遼寧省委第二書記。

(二)改組國防部領導人事：從林彪事件起，偽國防部長和總參謀長懸缺各達三年之久，始由匪黨軍委副主席葉劍英接任國防部長，另傳聞偽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接任總參謀長（迄今仍無任何資料可以證實）。總後勤部長懸缺二年之久，始由前副總參謀長張宗遜接任。總政治部主任因李德生調瀋陽軍區，亦懸缺一年之久，始傳聞由偽國務院副總理張春橋接任（迄今仍無任何資料足以證實）。這些人事安排，有不同的意義：一、以葉劍英為協調人，在共匪現存元帥級中，唯一沒有嫡系部隊的是葉劍英，他一生處於超然的地位，幫助毛澤東協調於各軍系之間，目前他的任務，不僅仍如往昔，并且還要幫助江青一派，從事這項工作。二、以鄧小平為過渡人；如果傳聞屬實，鄧小平出任總參謀長，則因他原是第二野戰軍的政委，在「淮海戰役」中，曾以總前委書記（黨的前敵指揮機關），領導二、三兩個野戰軍（當時稱為中原及華東野戰軍）贏得戰役的勝利，故他對二、三野部隊，都有影響力。加以目前十一個軍區司令員中，如李德生、陳錫聯、秦基偉、楊勇、許世友、韓先楚、皮定鈞等七人，都出身於原紅四方面軍或後來發展的第三野戰軍，就憑這些關係，毛澤東運用他對現職軍區司令員的影響力，以作為江青一派的過渡。三、至於張春橋，如果他出任總政治部主任的傳聞屬實，那麼他是江青一派最先問津軍權的秀才人物，他在周恩來的掩護，葉劍英的協調，鄧小平的影響之下，接替李德生掌握控制軍隊的政工（包括保衛）系統，抓住這個靈魂工具之後，只要不發生變故，則江青一派奪取軍權，已經算是成功了一半。

### 論毛澤東對軍隊領導的成敗問題

(四)收買解放幹部和擢拔新幹部：本文曾將重要的解放幹部加以統計，共有三十六人，其中担任重要領導職務的計有傳聞中的總參謀長鄧小平、總後勤部長張宗遜、海軍第一政委蘇振華、空軍政委王輝球、成都軍區司令員秦基偉、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砲兵政委王平、鐵道兵司令吳克華、政委崔田民、南京軍區政委廖漢生、福州軍區政委李志民、濟南軍區政委符立清、廣州軍區政委鍾漢華等十三人。其餘雖都是副職，如果表現良好，不難成為江青一派的班底。至於新擢拔的幹部，就目前發現者，計有二十人，除空軍二十一師師長超級擢拔為空軍司令員外，其餘也都破例擢拔為副職，或進入黨中央：如陸軍第二十一軍軍長胡焯擢拔為副總參謀長，二十六軍政委魏柏亭擢拔為總政治部副主任，總後勤部衛生部副部長張汝光擢拔為總後勤部副部長。海軍一二九潛艇艇長高振家擢拔為海軍副司令員，汕頭巡防大隊長孔昭年擢拔為海軍副司令員。空軍一師師長張積慧擢拔為空軍副司令員，空軍三軍軍長鄭炎擢拔為空軍副司令員。陸軍三十八軍軍長劉海清擢拔為北京軍區副司令員，二十四軍軍長蕭進選擢拔為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十三軍軍長吳效閔擢拔為昆明軍區副司令員。空降十五軍軍長張顯揚擢拔為武漢軍區副司令員，空軍軍事學院訓練部副部長蔡嘯選拔為匪黨十屆中央委員，戰鬥英雄孫玉國、陳代富，海軍南海艦隊航空兵副司令員張懷連，陸軍十三軍軍長（接替吳效閔者）張英才，二十三軍政委宋雙來，二十六軍軍長趙峯，四十軍軍長趙興元，均選拔為匪黨十屆中央候補委員。這些新擢拔幹部，自然更是江青一派在軍事上的新班底。

## 五 江青能否繼承毛家天下

如上所述，毛澤東培植江青一派，先爭黨權，爾後再奪取軍權的若干措施，從表面上看，似乎都已經獲得若干成就。其實不然，這些措施和步驟中，都還隱藏着種種危機，例如：

(一)在控制黨中央權力機關方面：如一般所知，匪黨如果沒有軍隊作後盾，就沒有生存的地位。而匪軍，又是長於鬥爭性的，它對政治更具有過敏的性質。它能建黨，它更能毀黨。從它的建軍路線，軍隊教育來看，它永遠是洪水、猛獸，它吞噬敵人，也吞噬自己。江青一派雖然在匪黨十次全國代表

大會中，取得了黨中央的領導權，但軍隊更可以在一夜之間，推翻黨中央領導機關。一九七四年初，王洪文罵軍隊是最大的障礙，主張用三十歲左右的人做軍區司令員，就在圖謀解除軍隊對江青一派的威脅<sup>②0</sup>。

(二)在調整地方權力結構方面：目前發現兼掌地方黨權的政委（包括第一第二政委），共有十五人，其中屬於江青一派的，只有北京軍區紀登奎、吳德、濟南軍區白如冰、廣州軍區韋國清、華國鋒、趙紫陽等六人，所掌握的勢力地區，也不過六個省（市），其餘都非江青一派，鑒於以往歷次反叛事件中，不乏總政治部主任、軍種、軍區政委在內，這次新組成的地方權力結構，屬於江青一派的勢力不僅非常脆弱，而且還存在嚴重的危機。

(三)在改組國防部及軍事領導機構方面：最大的問題是傳聞中總參謀長鄧小平，他是文化大革命鬥爭中被指名「劉鄧」的頭號，曾被紅衛兵戴高帽子遊街。如今他是黨的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再兼軍隊的總參謀長。在現職十一個軍區司令員中，與他有嫡系關係的佔有七個。這七人中，如出身紅四方面老幹部，在延安鬥爭張國燾事件中，曾發動反毛叛變<sup>②1</sup>，如許世友，即曾被毛澤東逮捕判刑，加以近年來若干解放幹部，充斥於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海、空軍總部及各軍區司令部，他們都是「生有反骨」的，在鄧小平領導之下，如果一旦發動反叛，毛澤東和江青一派將無生存的餘地。

(四)在擢拔幹部方面：李德生是一種重要的例子，他由十二軍軍長擢拔為總政治部主任，黨的副主席，最後他被捲入林案之中，撤除了副主席，降調瀋陽軍區司令員，這說明擢拔的幹部，并不一定忠於毛澤東，尤其不一定忠於江青，江青一派如果寄望這些幹部作為未來接掌軍權的班底，那不僅將會失望，而且也非常危險。

總之，毛澤東竊據中國大陸二十六年，其年事已達八十一歲，他的黨權、政權、軍權都不穩固，他在垂死之時，沒有一個可靠的幹部，正如他自己所說明的是個「孤僧」，最後只好依靠戲子出身的妻子，以及她所領導的一派，作為權力繼承人。他更飲鳩止渴就是傳聞中的運用鄧小平作為江青一派接掌軍權的過渡，這個危險的安排，如果毛澤東突然死了，由江青繼承的毛家天下，的幻夢當然完了。如果毛澤東的死期多延續幾天，將來發生何種變化，恐怕連毛澤東自己也無法預料。不過，自匪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

設置了五個副主席，似乎預防個人接班不成，在未來集體領導的形式之下，江青一派仍佔優勢，這也許是毛澤東退一步的打算吧？

（民國六十四年七月二十日稿）

附註：

①「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毛澤東選集一卷八七—九九頁，一九六六年，北京。

②「一九六〇年軍委擴大會議」，彭德懷總結的「人民軍隊七條建軍原則」，其中第一條為「必須強調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實行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第二條為「必須堅持政治委員制度，不斷加強政治工作」。匪軍高級幹部學習毛澤東軍事著作論文集，一九六〇年，北京。

③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附註，毛澤東選集一卷八八頁，一九六六年，北京。

④「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暫行條例」，赤匪反動文件彙編六册一九九二—一九九六頁，國軍贛粵閩鄂北路剿匪軍第三路軍圍獲資料，陳誠編輯，民國二十四（一九三五）年，武昌。

⑤「毛澤東在外部巡視期間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錄」，中共中央文件，中發（一九七二）十二號，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七日，北京。

⑥「關於遼瀋戰役的戰略方針」——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附註，毛澤東選集四卷一三三八頁，一九六〇年，北京。

⑦「關於平津戰役的戰略方針」——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附註，毛澤東選集四卷一三六八頁，一九六〇年，北京。

⑧「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毛澤東選集四卷一四四一—一四四五頁，一九六〇年，北京。

⑨「韓戰反共義士報告」，中華民國檔案資料，台北。

⑩「國家保衛局組織綱要」，奸匪反動文件彙編五册一六一—一六二〇頁，國軍贛粵閩鄂北路剿匪軍第三路軍圍獲資料，陳誠編輯，民國二十四（一九三五）年，武昌。

⑪「張聞天談話」，奸匪反動文件彙編五册一六一—一六六頁，國軍贛粵閩鄂北路剿匪軍第三路軍圍獲資料，陳誠編輯，民國二十四（一九三五）年，武昌。

——更重要的，福特總統對中東的堅強作風，在世界政壇中已獲得了顯赫的聲望。

季辛吉國務卿迫使以色列接受美國的撤軍建議，也是鏗而不捨的。季辛吉因熱中於「穿梭外交」努力所受之挫折，使國務院同僚們大多主張中東問題交給日內瓦和平會議解決，而唯有副國務卿席斯科（Joseph Sisco）仍然支持季辛吉的計劃。

季辛吉對於解決中東問題所堅持的基本原則，是以國家人民的利益至上，亦以以色列人與阿拉伯人的相互利益為重，因為：⑫

——美國對以色列的生存和福利負有歷史和道義上的承諾。

——美國在阿拉伯世界中有特殊的利益。

——中東危機一旦爆發，將會嚴重的損傷美國與歐洲及日本的同盟關係。

——中東情勢的持續緊張，將來國際間定會遭受新的石油危機，世界的經濟復甦亦會遭到嚴重的影響，這種情勢不但足以威脅工業世界的福祉，更將損及於全球上的每一個國家。

——中東危機導致美俄之間的直接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危險，而且已經開始給兩國帶來了日益增加的危險。

以色列在美國的壓力之下，加以在政治、經濟和軍事各方面都必須仰賴於美國，所以終將在對埃及之新協議談判中再作讓步，是必然的趨勢。

然而，即或以、埃之間能達成一項新隔軍協定，但未來的撤退問題，包括大部分西奈半島及戈蘭高地地區，以及整個約旦河西岸地區，是否能獲得解決呢？而又在何時獲得解決呢？

照目前情勢看來，中東問題已經拖了八年之久，而以色列從蘇彝士運河東岸僅僅撤退了十英里，現在以色列總理拉賓揚言在五年之內再從西奈沙漠撤退二十英里，照此比例推算，以色列從其餘西奈地區撤退將需要五十年的歲月。⑬

從長程看來，中東前途不容樂觀，正如福特總統所說，中東情勢拖愈得久，而戰爭爆發的危機愈深！

註①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ly 14, 1975.

註② Tel Aviv, July 13, 1975 (UPI).

註③ London, July 15, 1975 (AP).

註④ Ibid.

註⑤ Ibid.

註⑥ Beirut, Lebanon, July 21, 1975 (AP).

註⑦ Washington, June 6, 1975 (NYT) By Bernard Gwartzman.

註⑧ Jerusalem, July 23, 1975 (AP).

註⑨ Ibid.

註⑩ Washington, July 23, 1975 (AP).

註⑪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July 21, 1975 (p. 5).

註⑫ Kissinger's Speech at Atlanta, Georgia, June 23, 1975.

註⑬ Time, July 28, 1975. 一九七五年七月廿五日脫稿

——上接第72頁——

⑫「李明瑞事件」，中共史論二冊二四七頁，郭華倫著，民國五十八（一九六九）年，台北。

⑬「富田事件」，中共史論二冊三三九—二四七頁，郭華倫著，民國五十八（一九六九）年，台北。

⑭「毛澤東與艾狄談話」，中共史論四冊二八三頁，郭華倫著，民國六十一（一九七二）年，台北。

⑮「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材料之一——『五七一工程紀要』」，中共中央發（一九七二）四號文件，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北京。

⑯「古田會議」，中共史論二冊十七—十九頁，郭華倫著，民國五十八（一九六九）年，台北。

⑰「遵義會議」，中共史論三冊十三—二〇頁，郭華倫著，民國五十八（一九六九）年，台北。

⑱「巴西會議」，中共史論三冊六十二頁，郭華倫著，民國五十八（一九六九）年，台北。

⑲「鬥爭張國燾事件」，中共史論三冊一七六—一七九頁，郭華倫著，民國五十八（一九六九）年，台北。

⑳「王洪文對中央讀書班的報告」，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北京。

㉑「紅四方面軍反毛叛變事件」，中共史論三冊一七九—一八一頁，郭華倫著，民國五十八（一九六九）年，台北。